

# 文革前勞動教育的觀念和實踐：以中學教育為例

• 石 岩

**摘要：**「勞動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語義場中有特殊含義，其出現雖與建國以來的青少年升學問題密切相關，但它不僅是應對學位不足的權宜之計。在中共的意識形態建構及中共領導的中國近現代轉型中，「勞動」始終是一個關鍵觀念，勞動教育也源於這一豐富的理論資源。本文以195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中學教育為例，試圖呈現出勞動教育觀念的轉變：1957年前，勞動教育的內涵和外延比較豐富，其後含義日益狹隘，從最初的「腦體並用」到體力勞動，最後收縮至農業勞動。同時，「勞動」開始反噬「教育」，狹隘化的勞動教育最終成為一代學生必經的磨練，在1960年代成為將逾千萬人捲入其中的上山下鄉運動。

**關鍵詞：**升學危機 勞動教育 上山下鄉 體力勞動 中學

## 一 引言

從1950到1960年代，中國青少年的升學觀和就業觀發生顯著變化：1957年前，升學仍然被視為學生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1957年後，體力勞動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國家試圖以此「逐步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sup>①</sup>，「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成為被批判和改造的對象。進入1960年代，更有逾一千七百萬知識青年響應號召，到農村這一「廣闊的天地」裏「大有作為」<sup>②</sup>。此間的觀念轉變和學校實施的勞動教育密切相關。

然而，中國自1950年代開始推行的勞動教育與該詞本意有很大不同：在1929年出版、山田敏一著的《歐美的勞動教育》一書中，「勞動教育」一詞指對勞動階層進行普及性的文化教育及職業教育，意即勞動者應具有必要的

文化知識同時也應有勞動技能<sup>③</sup>。據民國時期的學者研究，勞動教育在歐美的興起與其近現代轉型聯繫在一起：英國的勞動教育興起於十九世紀，許多鄉村自那時開始設立勞動者講習所，如機械學講習所、相互修養協會等。到十九世紀中後葉，這一趨勢又經大學擴張運動、產業組合運動、成人學校等的擴充，成為一股蔚為大觀的時代潮流。此間的背景是「英國在十九世紀時期，一步一步的向着政治的及社會的德謨克拉西進行；一般人民的教育和一般勞動者的教育，就是實現德謨克拉西的預備條件」。美國的勞動教育與此類似，尤可注意的是「工場為增進工人的知識，特設圖書室及閱覽室，舉行講習及演講」，以及開辦夜校、補習班等。勞動教育在德國興起的實踐略晚於英美，意在「為勞動者建立各種學校，使勞動者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sup>④</sup>。

民初，歐美的勞動教育觀點與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等思潮一起傳入中國<sup>⑤</sup>，成為現代知識份子塑造新國民的主張的理據之一。後經陶行知、晏陽初、黃炎培等教育家的闡釋與實踐，在1920年代之後，勞動教育主要強調「知行合一」，「腦體並用」（即體力、腦力並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並重）。概括言之，就「塑造新人」這一點來說，民國時期的勞動教育與1949年之後的勞動教育有相通之處，但兩者又有迥然不同的意趣：在《人民教育》1957年5月號刊登的〈教育的警鐘〉一文中，「勞動教育」指勞動應貫穿學校教育的全過程，其目的是使學生擺脫輕視體力勞動的「剝削階級意識」和「只尚書本知識、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劣根性」；使全體中小學生有勞動基礎，不能升學時自願勞動；使大學生擺脫「知識份子架子」，永遠向群眾學習<sup>⑥</sup>。《人民日報》於同年11月26日刊登的〈勞動教育和勞動實踐〉一文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的定義更為狹窄，專指「直接參加工業、農業生產的體力勞動」<sup>⑦</sup>。可見中共逐漸將「勞動教育」一詞改造為符合意識形態和實際需要的觀念。

根據筆者檢索，在1949到1965年的《人民日報》中，「勞動教育」一詞的頻繁出現與青少年升學問題密切相關。勞動教育實施之初，基層教師普遍將其視作「解決初中畢業生問題」的權宜之計，學生也認為「勞動教育，春來秋去」<sup>⑧</sup>。正因為勞動教育作為權宜之計的一面太易被識破，才使國家更需豐富其意識形態面相，使其更有感召力。勞動教育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面和作為權宜之計的一面如何互相建構？國家意志怎樣轉化為學校的教育行為？勞動教育因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學界以往對相關問題已有一些研究，但多屬宏觀討論。任雲仙、張耀和劉亞娟都注意到勞動教育與1954年升學危機的關係，但對升學問題在毛澤東時代的持續存在與影響未做深究<sup>⑨</sup>；丁文杰注意到勞動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不過他的分析限於政策和文件，未有討論具體實踐<sup>⑩</sup>；定宜莊清晰勾勒出文化大革命前歷次動員學生下鄉與升學率及經濟起落之間的聯動關係<sup>⑪</sup>，給本文極大啟發。

本文旨在探求195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勞動教育觀念的具體演變、實踐以及其對個體的影響。在學校教育的長時段中，本文主要截取中學教育，因為這是青少年價值觀的形成時期。除了檔案、內部及公開出版物、各省市文獻彙編，本文還採用了日記等私密史料並輔之以口述訪談作為研究材料。

## 二 勞動觀念進入教育的先在經驗

勞動古已有之，但「勞動」成為學者關注的觀念，則是在現代性形成的過程中。自十六到十九世紀，西方古典經濟學家、哲學家、啟蒙思想家等都曾就勞動問題做出專門論述，勞動觀念更是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sup>⑭</sup>。清末民初，上述觀點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引發迴響。梁啟超曾提出，財富有三個來源——土地、資本、勞力，而中國的問題在於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人太多，這種觀點受到斯密(Adam Smith)的影響。梁氏將對勞動的禮讚與對知識份子的批判聯繫在一起，將讀書人和奴婢、優妓並稱為「勞力而仍分利者」，「不知其所學作何用」的讀書人「在民為蠹，在國為虱」<sup>⑮</sup>。

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讓「勞工神聖」、「庶民的勝利」一類觀點廣泛傳播。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中，勞工問題一開始就成為核心議題。創刊於1920年的《勞動界》即以「讓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為宗旨<sup>⑯</sup>。貫穿1920年代，勞動一直是左翼刊物上的熱門話題<sup>⑰</sup>。除了辦刊，早期的社會主義者還創辦了工人夜校、平民教育演講團，實行本意上的勞動教育<sup>⑱</sup>。

在左翼知識份子禮讚勞動，並投身於啟蒙勞動者的同時，他們自身勞動觀念(尤其是體力勞動)的轉變卻殊非易事。1911年，毛澤東在長沙從軍時自認是學生，不屑挑水，「不肯降尊屈就，只有從挑水夫那裏買」<sup>⑲</sup>；1913年，瞿秋白在家中無米下鍋時「還用〔養〕着一個僕婦」，「我們從沒親手洗過衣服，燒過飯」<sup>⑳</sup>。左翼知識份子尚且如此，一般知識青年對體力勞動則更加輕視。中共早期領導人鄧中夏批評新式學堂只培養了一些「變相的廩生……秀才」，學生畢業後「披件長衫子，拖對爛布鞋，表示他特殊的地位……而誠實的狹見的鄉民亦以此視之」<sup>㉑</sup>。社會學家李景漢發現，「凡受過高等小學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間工作」<sup>㉒</sup>。

蘇區時期，中共開始作出一些新意義上的「勞動教育」的嘗試：蘇區小學常以「勞動」命名，偵察、放哨等課外活動受到特別重視；小學語文科的第一課是：「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sup>㉓</sup>延安時期，中共的勞動教育觀念初具輪廓，毛澤東這一時期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日後被視作勞動教育的理論依據：雖然毛澤東仍將知識份子看作動員者和組織者，但他同時強調知識份子最無知，工農兵比知識份子「乾淨」，知識份子應先向工農兵學習<sup>㉔</sup>。這些提法既符合無產階級政黨的意識形態，與梁啟超的說法也有相通之處。

1943年之後，中共在延安着手變「舊教育」為「新教育」，在從舊到新的轉變中，勞動觀念被植入根據地小學國語、自然、常識、算術等教材中：各根據地語文書中勞動相關內容約佔30至40%，其中有鼓勵兒童勞動的兒歌。自然課本中有豐富的生產知識，關於洋芋的一課，介紹了洋芋的種植和貯存，文字樸素、詳盡而實用。此外，自然課還會講授「甜菜製糖法」、「鞣皮與製革」、「怎樣保守水源」的實用生產、生活知識，並帶領學生向老農調查各種廣為流傳的農諺。數學課亦不乏結合生產的實際應用，以土地、人口、牲畜數量來教授算術<sup>㉕</sup>。

在這種「新教育」的嘗試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界限開始鬆動。在中國，知識份子這一問題的提出者，因此他們從一開始就被置於特殊位置。

有趣的是，日後動員廣大學生從事體力勞動的革命先行者，年輕時對體力勞動均有一定隔膜。伴隨中共領導區域的擴大，勞動教育被付諸實踐，並被視作「新教育」的應有之義。

### 三 建國初期勞動教育的理想主義色彩

1949年後，「愛勞動」成為國家提倡的新道德之一。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十二條提及：「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sup>⑳</sup>延安經驗為勞動教育提供了樣板。身處物資匱乏時代，勞動正式引進學校教育之中，其中也有學校生產自助的考慮。1950年代初，河南林縣第一中學的學生打土坯蓋閱覽室、鋪路、修橋、砌圍牆、平整操場，並「開荒地種菜、種糧食」，種樹<sup>㉑</sup>；1950年春，北京市委撥出2,032畝土地，市人民銀行提供價值等同495,414斤小米的低息貸款，號召學生課餘種菜<sup>㉒</sup>。然而，至少在北京，生產自助的效果並不明顯：北京兩所學校的259名學生因長期營養不良，全部患有夜盲症，很多患口角炎、口腔炎、舌炎、陰囊炎等疾病<sup>㉓</sup>；一份調查報告承認，「中學生的伙食，雖有農業生產補助，一般仍很差」<sup>㉔</sup>。不過，一些學校推行勞動教育時嘗試因地制宜、靈活多樣地融合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在勞作課上學習用罐頭盒做小茶杯，製作毛巾掛、鐵絲筆架、小板凳，打毛線、做棉鞋棉衣<sup>㉕</sup>；政治課上力求讓學生認識「勞動創造世界」；史地課「通過古代人民改天換地的實踐激發學生對勞動和勞動者的尊敬」；體育課以「培養學生愛勞動的習慣，建立正確的勞動觀」為目標<sup>㉖</sup>。

隨着1950年代蘇聯中學生升學問題的凸顯，一度被完全取消的勞動教育的熱度迅速回升——蘇共十九大和二十大都出台了加強勞動教育的政策<sup>㉗</sup>。蘇聯的勞動教育熱與中國開始重視勞動教育的時間恰好重合。當時中國學校幾乎所有勞動教育理論和形式都可以在蘇聯找到樣板，例如勞動衛國制、綜合技術教育、公益勞動、值日生制度、「萬能手小組」、「腦體並用」概念等，可見在當時中國外交政策向蘇聯「一邊倒」的氛圍中，勞動教育與其他領域一樣，較多受到蘇聯影響<sup>㉘</sup>。

在蘇聯理論影響下，勞動教育成為「全面發展的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目標是「逐步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在這一框架下，德智體美都被認為與勞動教育密切相關<sup>㉙</sup>。借助這一理論，勞動教育被泛化成一個多元而生動的概念：體力勞動至上的觀點尚未形成，勞動教育與智育緊密掛鉤，並呈現出一種面向未來的理想主義氣質。這在師大女附中學生吉敬容的勞動日記中有生動呈現：1954年新學期伊始，師大女附中成立了以推廣工藝和科學為宗旨的「萬能手小組」；在少兒科技及工藝作品展上，有初中生做的自動掘土機模型、大型汽油動力飛機模型，有小學生製造的自動降雨機等；在以「向科學進軍」為主題的少年先鋒隊大隊活動日上，展出了雜交兔子、混合油發動機和喀秋莎火箭炮<sup>㉚</sup>。

1955年10月17日，毛澤東發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政策迅速體現在勞動教育之中<sup>⑤</sup>。報告發表不到一周，吉敬容所在班級就和京郊紅旗生產合作社建立了聯繫，此後一年學生和社員多次互動。在一次與「友誼班」——北京市第八中學的男中學生共同勞動時，吉敬容注意到：

八中一個清秀的高個子搶着在灶邊生火，汗水浸透了他雪白的襯衫……當我們要接替他時，他肩一聳，說聲「幹嘛！幹嘛！」不讓別人佔他的位置。

還有個穿黃背心的男生……在家天天做一家人的飯。我們燒茄子不知向農業社要多少斤夠，就估算着先要40斤，心中無數，又加到55斤。這男生果斷地說：「55斤吃不了，就50斤得了，多了剩下浪費！」

吉敬容由此得出結論：「謙虛、肯幹、扎實，男孩子們有優點。」

在農業社，學生上午翻土豆，幹活辛勤得像「小泥猴兒」，下午打撲克、下棋、打籃球和網球，晚上跳集體舞。五天學農結束，吉敬容重要收穫之一是「學會了和男生打交道，一起幹活，交談」——此類感受是1950年代的中學生共有的。經由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勞動的底色浸染到他們的人格中。國家着力營造的風尚體現於一些細微的價值判斷上（比如把勤於勞動視為男性魅力的體現），並且和令人愉悅的學校經歷聯繫在一起，變得生動而有感召力。

熱氣騰騰的場景不限於學農。1955年10月，教育部發布的〈關於1955-1956學年度中學實施基本生產技術教育的指示〉稱：「基本生產技術教育（即綜合技術教育）是全面發展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任務是使學生了解一切生產過程的基本原理，並使他們獲得運用簡單的生產工具的技能」，「中學教育的任務是培養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成員，是培養建設社會主義的後備力量」，所以「物理、化學、生物、數學、製圖、地理六科的教學應當密切結合生產實際進行」<sup>⑥</sup>。1956年，師大女附中建立實驗園地和實習工廠，並開設了金木工、汽車等實習課。9月，「世界上第一座由青少年操作的水電站」北海少年先鋒隊水電站投入運營，吉敬容是第一批工作人員之一。「神秘有趣的『動手』〔當時的教育理念強調「動腦動手」，「動手」即實踐性的教學活動〕」吸引着她，使她興奮不已。

與此同時，一些農村學校緊跟國家大力推廣的農業技術，開展基本生產技術教育。河南林縣一中動物小組的高溫快速養蠶法登上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通報》；植物組嘗試了紅薯的溫湯浸種、高溫育苗、玉米的去雄授粉和蔬菜的嫁接。在介紹深耕時，學校強調深耕並不是愈深愈好，「把土翻到一尺五寸深，反不如耕三、四寸深好」<sup>⑦</sup>。對比後來大躍進時期盲目的「深耕」，當時的勞動教育是尊重常識的。不過，限於「全國絕大多數高中，還缺乏實行綜合技術教育的機械等設備」，基本生產技術教育課尚未全面推廣便在1957年9月被叫停了<sup>⑧</sup>。儘管不盡如人意，建國初期的勞動教育仍有極強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想主義色彩，並在一代人的生觀和價值觀中留下印記。

## 四 升學危機與勞動教育的國家推廣

據筆者觀察，如果沒有從1953年開始持續出現的升學危機，勞動教育所負載的道德感召力或許會更加純粹，但持續的升學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勞動教育的動機，使勞動教育由純粹的將勞動觀念融入教育之中，轉變為針對畢業生出路問題，鼓勵學生主動放棄升學機會，畢業後參與生產工作。自清末實行新式教育，各級學校畢業生升學和出路問題一直存在，「每年遞增數萬以上之畢業學生，欲求學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機斷絕，路路不通」<sup>⑳</sup>，1949年後這一問題並未解決。從表1可見，從1949到1965年，初中的學位不足問題持續，而在1953年開始加劇；初中升學危機顯現於1954年，1957年加劇；高中升學危機顯現於1957年。因倡導大辦學校、提高升學率，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和1958至1960年「教育大躍進」中，中學升學危機一度得到緩解，但在1961年情況再度惡化。

1956年，全國高等院校大舉「擴招」，教育主管部門的煩惱是中學畢業生不敷大學招收。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樂觀的元旦社論：由於農業合作化提前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將要提速，社會主義工業化將要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將要超額完成，工農業發展對交通、文化、教育、科學、衛生提出了新的要求<sup>㉑</sup>。同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

表1 畢業生及上級學校招生人數對比(單位：萬人)

年份	小學畢業生 (A)	初中招生數 (B)	B-A	初中畢業生 (C)	高中+中專招生數 (D)	D-C	高中畢業生 (E)	高校招生數 (F)	F-E
1949	64.6	34.2	-30.4	21.9	7.1+9.8	-5	6.1	3.1	-3
1950	78.3	50.1	-28.2	23.4	10.8+12.8	0.2	6.2	5.8	-0.4
1951	116.6	80.6	-36	22.5	9.1+23	9.6	5.9	5.2	-0.7
1952	149	124.2	-24.8	18.5	14.1+35	30.6	3.6	7.9	4.3
1953	293.5	81.8	-211.7	39.8	16.1+19.4	-4.3	5.6	8.1	2.5
1954	332.5	123.6	-208.9	57.6	19.5+15	-23.1	6.8	9.2	2.4
1955	322.9	128.2	-194.7	87	22.1+19	-45.9	9.9	9.8	-0.1
1956	405.1	196.9	-208.2	78.5	37.4+46.2	5.1	15.4	18.5	3.1
1957	498	217	-281	111.2	32.3+12.3	-66.6	18.7	10.6	-8.1
1958	606.3	378.3	-228	111.6	56.2+89.5	34.1	19.7	26.5	6.8
1959	547.3	318.3	-229	149.1	65.6+70	-13.5	29.9	27.4	-2.5
1960	734	364.8	-369.2	142.2	67.8+106.6	32.2	28.8	32.3	3.5
1961	580.8	221.8	-359	189.2	44.7+16.7	-127.8	37.9	16.9	-21
1962	559	238.3	-320.7	158.4	41.7+3.9	-112.8	44.1	10.7	-33.4
1963	476.8	236.5	-240.3	152.3	43.4+15.5	-93.4	43.3	13.3	-30
1964	567.4	286.6	-280.8	138.6	43.8+24.9	-69.9	36.7	14.7	-22
1965	667.6	299.8	-367.8	173.8	45.9+20.8	-107.1	36	16.4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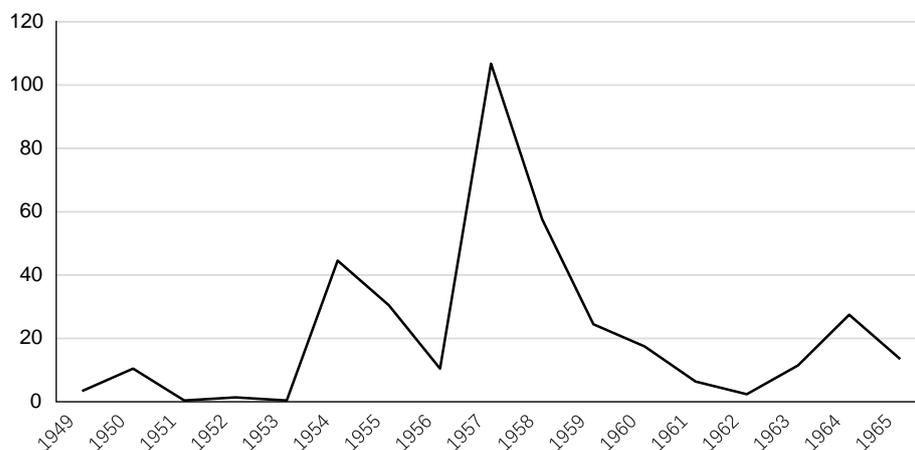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計劃財務司：《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頁24-27。

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上說：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引起農業合作化的突飛猛進，這將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十二年的農業發展規劃實際上將要決定在此後十二年中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可以用甚麼速度來發展<sup>④</sup>。2月24日，〈中央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按計劃增加高等學校學生的名額<sup>⑤</sup>。

在上述精神的引領下，1956年全國高等學校計劃招生165,550人，再加上應招的留蘇預備生名額，總招生人數十七萬，但當年高中畢業生僅十五萬六千多人，「遠不敷高等學校招生的需要」<sup>⑥</sup>。教育主管部門認為，中學生供不應求將是長期現象。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在一個報告中指出：「高中畢業生一直到1958年都不能滿足高等學校招生的數額，到1959年，高等學校招生同高中畢業生相比，也只是1:1.23」，「從初中畢業生方面看，前兩年出現過一種假象，好像是初中畢業生有些過剩……但是，從今年起，各方面都已經感覺到初中畢業生不夠了。1956年初中畢業生數預計為787,073人，即使全部升學也不能完全滿足高級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招生數字」<sup>⑦</sup>。有鑒於此，《人民日報》連發社論，動員在職幹部、小學教師、師範和中專應屆畢業生、復轉軍人、公私合營企業職工、工商界知識青年、停學待業知識青年和應屆的高中畢業生一起參加高考<sup>⑧</sup>。「擴招」政策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56年夏季，有351,400多人報讀高等學校，比上一年度高校統一招生數字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應屆高中畢業生144,000多人，其餘為社會生源<sup>⑨</sup>。

建國以來，招生被納入國家規劃，規劃一旦失當，問題會成倍放大。1953年開始的小學升學危機與國內局勢穩定後就學人數持續增加有關，也與優先發展高等教育的政策有關<sup>⑩</sup>。毛澤東曾將1956到1958年形勢稱作「馬鞍形」：1956年是「小躍進」，1957年是「躍退」，1958年是「大躍進」<sup>⑪</sup>。從「小躍進」到「躍退」，計劃驟鬆驟緊造成嚴重的升學問題，「小高潮」難以為繼，1957年3月張奚若指出：「小學、中學畢業生不能全部逐級升學的現象，不僅在今年，並且在今後很長時期內也將存在」，「要求中小學畢業生全部逐級升學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不合理的」<sup>⑫</sup>。6月，劉少奇在一次內部報告中說：高小畢業生

圖1 「勞動教育」在《人民日報》上的出現次數



資料來源：筆者據1949至1965年《人民日報》統計。

500萬，不能升學的400萬；初中畢業生100多萬，不能升學的80多萬；高中不能升學的8萬，「這一問題牽扯到一切人」<sup>60</sup>。

在升學危機洶湧而來的1954年，「勞動教育」一詞在《人民日報》上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加，勞動教育從若干學校的教育措施變成國家政策，該詞的意義也再度轉變。從圖1可見，「勞動教育」在《人民日報》上出現的波峰時段與升學危機出現的時間大體重合，《人民日報》在不同年份談到勞動教育時，既在話題上一脈相承，又各有側重。

1954年是「勞動教育」的重新定義時期。相關文章指出了其與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關係，批評了過去忽視勞動教育的做法，指出勞動教育將是長期的；對升學危機給出的藥方是動員農村小學畢業生回鄉務工，以減少升學人數，強調了勞動教育的政策動機：「結合總路線的宣傳教育，說明高小和初中畢業生不可能全部升學，應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的道理」，「根據國家工農業生產建設的需要以及今後教育發展的可能條件，組織高小與初中畢業生參加工農業生產，是解決他們出路問題的主要方向」；「把勞動教育當做經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單純的把勞動教育看作是就業教育，或看作是對應屆畢業生的臨時突擊任務都是不妥當的」<sup>61</sup>。此後，勞動教育的熱度有所下降，理性的意見也得以表露，如重申勞動教育應與智育並重<sup>62</sup>。

1957年，勞動教育的推廣再度升溫，《人民日報》有九篇社論和五篇頭版報導與此有關。勞動教育的含義變得愈來愈全面，家庭、學校、共青團、少先隊都被要求對青少年進行勞動教育；務農的動員面從高小擴展至中學，為此，中學增設農業基礎知識課，農村高小增設農業常識課。「腦體並用」不再被提及，開始強調勞動教育所謂的「勞動」特指體力勞動。此後兩三年內，「勤工儉學」、「又紅又專」、「支持農業是教育戰線的光榮任務」等新口號陸續見諸報端<sup>63</sup>。

1960年代初，隨着大躍進的失敗，「勞動教育」一詞一度從《人民日報》淡出，但從1963年開始其熱度緩慢爬升，並開始將「勞動教育」和「階級教育」並舉：「不以階級教育為基礎，就不能解決任何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問題。忽視了階級教育，無論怎樣強調勞動教育和集體主義教育，都不會取得成績。」將階級教育作為勞動教育的基礎，意味着體力勞動「神聖化」，強調學生、知識份子應向工農學習；在時間層面，全國中學掀起學工、學農熱潮。是否積極勞動成為「階級覺悟」的衡量指標<sup>64</sup>。1964年是《人民日報》勞動教育議題的第三個小高潮，因其理論建構在1950年代已大致完成，當時除了與階級鬥爭相結合，已鮮有理論創新，只是繼續呼喊已有的口號，以配合1960年代初的第一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957年，勞動教育的推廣再度升溫。(圖片來源：《人民日報》，1957年3月16日，第1版)

通過對《人民日報》上的「勞動教育」做詞頻和語義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勞動教育作為權宜之計的一面：它時熱時冷，外延可大可小。有需要時，它出現在報紙的各個版面，層出不窮的實例編織成一個遍及各級學生的網絡，衍生出諸多話題；遇冷時，它只會以域外經驗、古詩摘抄的方式保留在報紙上<sup>55</sup>。

## 五 勞動教育衍生的社會矛盾

值得追問的是，作為國家政策的勞動教育是否能被基層接受？1953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引導農村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乃是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的基本辦法」<sup>56</sup>。社論發表後，部分地方政府擔憂高小畢業生太多，難以處理他們的出路問題，於是人為製造留級，如黑龍江省一些市縣留級生佔20至30%；其他省市不少高小畢業生不能參加升學考試。據河南等二十一個省市統計，動員高小畢業生返鄉務農引發自殺事件99起，失蹤17起，還有5人精神失常<sup>57</sup>。讀書改變命運的道路被堵塞之後，農家子弟因此而產生的失落感可見一斑。

勞動教育實施之初，一些學校「孤立地強調學習就是勞動」，另一些「把勞動與學習對立起來」，認為想升學就是思想落後，動員學生回家生產<sup>58</sup>。河北省樂亭縣汀流河完全小學教師杜奇儒第一次講勞動教育時，「覺得很難開口，臉也紅了，又看看學生在下面擠眉弄眼，好像說：『你前幾天還說當莊稼漢沒出息，今天為啥又來這一套呢？』」對於學校的宣傳，學生表面點頭稱是，心裏仍認為「升不了學就沒有前途」，或「大吵大鬧，不願學習，準備留級」，「早晚得上家裏蹲大學、農業系、高粱科」，不如不學習<sup>59</sup>。

這種抵觸情緒在1957年進一步加劇，國家招生政策在1956年「教育事業大發展」的失誤後180度轉彎，大幅度減少升學人數，令學生和家長很難跟上。河南洛寧二中在家訪中發現：「去年〔1956年〕教育事業大發展，初中畢業生大部分升學，沒有升學的也參加了工作，因此學生和家長們的思想今年只有升學的打算。家長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上學就是為當官』等舊意識還普遍存在。」七十九位家長中有七十四人打算讓孩子升學，學生「手不離書，書不離手」，「三個通夜沒睡，眼熬得腫着還學習」；有人甚至因升學無望自殺、自殘<sup>60</sup>。其他省市的情況也大抵如此，如長春中學應屆畢業生中有90至95%打算繼續求學<sup>61</sup>。面對學校的勞動教育，江西某校大部分高三學生「思想關門」——不願寫周記，不肯多講話，匯報思想時最多說一句「跟過去差不多」，有人指出勞動教育中的師生是學校最尖銳的內部矛盾：「當前，學校內部矛盾……根本上還是個人觀點和集體觀點的衝突，或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衝突」，「從教師和學生要求不一致來看：目前最突出的是勞動教育問題」。教師鼓勵學生「不能升學就參加體力勞動生產，特別是參加農業生產」，學生則認為「參加農業生產是浪費人才，大材小用」<sup>62</sup>。

中共高層很快意識到升學問題的嚴峻。1957年2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南下視察，升學問題是他此行的關注點之一。劉少奇與各地中學生的談話經過雅馴化處理，以〈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為題發表在4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欄。此文在肯定「我國的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的前提下，承認1956年招生工作「有缺點和錯誤」。國家應逐步普及小學教育，繼續發展初高中、大學教育，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會有大批中小學生不能升學，其出路在於從事農業生產——認為下鄉種地「丟人」、「沒出息」的想法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國已基本消滅了「腦體對立」，輕視體力勞動是中國知識份子劣根性的體現，因此青年學生應端正思想、批評錯誤言論，明確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黨中央、各地黨委把主要力量放在農村，幹部都在下放，何況學生——中國革命和建設需要有人甘當「傻子」<sup>③</sup>。

在理想主義盛行的氛圍中，上述論證應有相當的感召力，但在畢業生出路問題面前，意識形態的教化仍顯得蒼白無力。1957年，武漢約有23,000多名初中、小學畢業生不能升學，除農業和服務業可吸收的6,500人，剩下16,000多人沒有着落。上述社論發表時，正是武漢學生議論紛紛之時：「美國青年失業、失學報紙宣傳，我們失學就不宣傳了。我們的命運掌握在幾個坐在屋子裏的領導人手裏，我們要組織八百萬初中生進行一次鬥爭。」「考不上學校就到教育局門口賣西瓜、擦皮鞋，丟國家的臉。」「我們學幾何與理髮有甚麼關係，難道剃頭可以剃個平行四邊形嗎？」<sup>④</sup>諸如此類的言論當然難說「正確」，卻清楚地顯示出國家所宣揚的意識形態與民間價值之間的差距。

「漢陽一中事件」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sup>⑤</sup>。1957年6月12日，漢陽縣第一中學教師李穗在組織教學時無意中提及：該年的升學率只有5%，學生必須加倍努力學習；其根據是孝感專區下達的招生計劃中，漢陽縣應屆初中畢業生1,001名，計劃只招收一個高中班（50名）。當時該計劃被認為是「機密」，「不准公布」。李穗的洩密行為產生了嚴重後果：該校學生大多出身貧窮，每周回家背米，赤腳來去，很多學生希望藉升學金榜題名，該計劃粉碎了他們的希望，隨後學生湧向校長辦公室、縣委、縣政府抗議。時任縣長韓茂林回憶，抗議學生只有一個要求：讀書。在質詢過程中，學生曾與幹部發生肢體衝突，但在工人呼喊著「保衛縣委」的口號趕到後，人群很快散去。

漢陽一中事件在毛澤東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四天後發生，因而很快就被定義為敵我矛盾。漢陽縣各單位通宵值班，電廠、監獄、廣播站和兵役局等單位架起電網；湖北省委派來一船全副武裝的軍人穩定秩序；由孝感專署副專員兼公安處長牽頭的地縣聯合考察團上百人進駐漢陽一中，全校師生被禁止出入，隨之而來的是大檢舉、大揭發，聲勢「超過土改」。考察團認定，漢陽一中師生書寫了474條「反動標語」。事件中一些廣泛流傳的謠言，如學生要砸電廠、攻郵電局、控制通訊系統、攻入公安局、搶槍枝、劫監獄、劫犯人等，均被視為重要罪證。

9月6日，副校長王建國、漢陽的民盟（中國民主同盟）成員楊煥堯以及該校語文教研組長鍾毓文因此被判處死刑：王建國出身富農家庭，參加過「三青

團」，並曾勸解縣委釋放被扣查學生，被認定為事件主謀；楊煥堯是連接漢陽與民盟中央右派的一根「黑線」；鍾毓文在王建國的批鬥會上眨眼，被視作「傳遞消息」。除被判死刑的三人，此案無辜株連者九十餘人，其中包括多名未成年學生；已被上級學校錄取或被招工的學生被開除學籍、公職，多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

漢陽一中事件並不孤立。1957年，各地曾因升學問題發生多起學生抗議事件。這些事件多作為「右派」煽動鬧事的罪狀見諸報端，如天津第四十七中學學生在校內散發傳單，聲稱「絕不回農村」，並制訂了遊行路線，準備聯絡他校學生，一起到市人民委員會請願<sup>⑥</sup>。在漢陽一中事件後，當局大量使用大眾傳播手段以儆效尤，《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湖北日報》、《長江日報》等報刊紛紛發表消息、通訊和社論；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製作的新聞片《鐵證》，講述漢陽一中事件背後的「陰謀」與「黑幕」，在全國各地放映<sup>⑦</sup>。

經歷這樣聲勢浩大的宣傳，恐怕不會再有學生就升學問題公開表達不滿。漢陽一中事件表明，勞動教育的意識形態建構有其「適用範圍」，在畢業生出路問題面前，勞動教育是無力的，政策上的循循善誘讓位於由上而下的彈壓。

## 六 1957年後勞動教育的政策實踐

1957年是青少年升學觀和就業觀轉變的年份。變化並非一蹴而就，但仍然有迹可循。1957年前，從學生的抵觸行為顯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舊意識」表現得比較直白；此後，這種觀念只能埋進人們心裏，在私下交談和組織挖掘「活思想」時才會有所流露。1958年，師大女附中的一些學生反省時指出，過去曾有如下看法：「長大以後做一個醫生或工程師，掙那麼多錢，過富裕的生活……才叫幸福呢！」「到農村工廠幹一輩子，想不通。」對於「又紅又專」，有學生曾認為：「為人民服務，主要用所學的知識。只專不紅要比只紅不專好得多。」學校認為，這樣的想法源自家庭的影響：「五類家庭」輕視體力勞動、農業勞動，對黨的階級路線不滿，對孩子考不上大學情緒很大，總是教育孩子「唯有讀書高」<sup>⑧</sup>。

然而，是否只有「五類家庭」信奉「唯有讀書高」呢？李若建觀察到，「又紅又專」的提法出現後，很多家庭暗地裏仍希望子女走「專」的道路：「白專」（專注於學術研究而不關心政治）只要在政治上不被列入反動之列，有中專及以上的文憑，收入還是比工人、農民要高，社會對於知識份子的需求仍普遍存在<sup>⑨</sup>。王奇生讀中學時，高考尚未恢復，父親每晚督促子女在油燈下讀書，指出不管哪朝哪代，讀點書總比不讀書好；因為父親是會計，就比一般農民少幹體力活<sup>⑩</sup>。王書香也有類似體會，她出身中農，因讀書好，每次有工作組進村都會成為倚重對象，「工作組找人幫忙也找有文化的」<sup>⑪</sup>。類似的經驗在當時並不鮮見，但往往心照不宣；「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轉入地下的原

因很明顯：經歷了反右運動和漢陽一中事件那樣的彈壓，已很少有人會公開表達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看法。

在輿論收緊的同時，勞動教育成為全社會參與的宣傳工程。四川洪雅縣用一個月時間進行「正確對待升學就業問題」的宣傳，幹部、教師和民間藝人組成宣傳隊，利用圖片、快板、活報劇等形式上街宣傳農業勞動<sup>⑳</sup>。武漢郊區回鄉務農學生預備生活用品有困難，各街道、黨、團、婦聯組織、學校、企業、部隊等都被發動起來，街道熱心組織捐獻，居委會支援學生黃永年生活用品十三件，「街坊們比他母親還想得周到」<sup>㉑</sup>。北京市豐台區蘆井村的王金才沒考上高中，精神苦悶，看到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到農村參加勞動後表示：「大學的老師都來勞動，我個初中畢業生算啥。」<sup>㉒</sup>這些片段雖出自當時的匯報材料，但未嘗不是時代氛圍的體現。

大躍進時期國家出台了一系列勞動教育政策。1958年8月，陸定一提出「教育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sup>㉓</sup>；劉少奇在1957年即提出過鼓勵在校生「勤工儉學」，參加課餘勞動<sup>㉔</sup>。其觀點得到進一步發展，劉少奇進而提出全日制和半工半讀是中國應有的「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並以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赴法留學時「勤工儉學」的經歷為論據<sup>㉕</sup>。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在一切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學校辦工廠和農場，工廠和農業合作社辦學校」，既是「教育大躍進」的一個面相，又說明勞動與教育密不可分<sup>㉖</sup>。

在普通學校之外，包括農業學校在內的多種結合勞動的辦學形式在大躍進時期一哄而起。以吉林省為例，1958年高峰時，農業中學的在校生數量是普通中學的37.7%，意味着全省近40%的學生不能按「正常」的學業安排學習<sup>㉗</sup>。農業中學的教學安排是典型的「半工半讀」，如北京通縣教育局規定，農業中學全年教學和勞動時間各六個月<sup>㉘</sup>；課程中除了政治科被特別強調，授課標準向普通學校看齊，其他課程都做了「為農業服務為生產服務」的調整，物理、化學和生物三科中與農業生產無關的內容被刪去<sup>㉙</sup>。

針對普通中學，教育部在1958年對學生參加體力勞動的時間（兩個學期一共為十四至二十八天）和生產勞動課的授課時數（二小時）做了規定<sup>㉚</sup>。事實上，大躍進時期學生的勞動時間遠超於此：1958至1960年間，山東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平均勞動天數約佔在校總天數的40%左右，1958年佔70%；1958年，雲南南華縣的學生只有不足四個月的學習時間，其他時間勞動<sup>㉛</sup>；同年，廣東寶安縣中學和小學四年級以上的學生都實行半日制教學，每天二至四小時回生產隊勞動，農忙則全力支持農事活動<sup>㉜</sup>；從1958年9月到11月底，北京大部分中學已停課數周，有些中學一直沒有上課<sup>㉝</sup>。1960年，寶安縣南頭中學的學生每個周末都要上山砍柴、打坯燒磚，需定期耕作，當時還有開採鐵礦的任務，每學期有一個月重體力勞動的「勞動教育」；1960年代就讀該校的學生「對學校的教學印象不深，深刻的有兩項：一是餓，二是勞動多」<sup>㉞</sup>。

即使像師大女附中這樣的重點中學，勞動也是重要的教育內容。1958至1959年間，吉敬容所受的勞動教育大多與政治運動相關聯，且充滿意識形態

的象徵意味：1958年1月1日，她在日記中自責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的定型人」，「階級感情非常模糊」，「將來一定沒有出息，做不出工農群眾那樣大的貢獻」。在反右的氣氛下，勞動成為「淨化」的儀式，同學間聊天的話題均是「紅」與「專」的關係。學生去農村勞動，分到的農活是「溜糞」和深耕土地，休息時不再打網球、跳集體舞，而是聽講農村的階級鬥爭。去門頭溝植樹之前，學生進行了半軍事化的訓練，選舉了政治中隊長和生產隊長；去香山植樹時因沒有工具，吉敬容用手握石頭，手指流血。在「消滅麻雀運動」中，師生奮戰四天，「風、雨、曬都嘗到了」，到後來「一天七個小時的轟喊，也難得見到七隻麻雀飛過」。在「大煉鋼鐵」中，畢業班晚上煉鋼，白天上課，其他年級停課。吉敬容勉勵自己：「勞動使我們鍛煉成鋼」，「溫室培養怯弱，烈火熔煉金鋼」。

在勞動的淬煉中，也會有一絲懷疑在吉敬容心頭閃過。1959年8月，她在黃土崗公社參加「防澇搶收搶種秋菜的戰鬥」，學生全天勞動11.5小時，「地裏不時有西紅柿腐爛的臭味撲鼻而來，泥水陷到腳脖子以上，走一步，拔一步」，白薯沒有收成，全部拉秧（即把秧苗全部拔出廢棄）。公社團委會號召團員「十一貢獻十萬個蘿蔔」，喇叭裏不時傳來「誓師」的聲音，吉敬容卻發現社員不聽指揮，這讓她想到：「『一大二公』不能完全促進生產發展。」然而「雜念」很快就被時代的感召所吞沒。學校組織學習八屆八中全會公報，吉敬容慶幸自己為「三面紅旗」出過力，想到父親右傾，又有點擔心自己能否考大學。1959年最後一天，她在日記中為國家產出1,300萬噸鋼而歡呼，同時覺得在「大躍進」的祖國面前，自己「像罪人一樣抬不起頭來」——這種「原罪」意識很值得我們體會。祖國是從何時起佔領道德制高地，以至於讓一個女中學生一天勞動11.5小時，手握石頭流血仍心存愧疚？

1958年前，教師尚需要煞費苦心將勞動教育滲透到學科教育中；1958年後，隨着大躍進的進行，勞動和教育已經難分難解。「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促使學生進一步摒棄「唯有讀書高」的「舊意識」，讓一些學生主動放棄以升學作為出路；大躍進時期不少學生被動員參與煉鋼、種地等工作，其後被動員下鄉務農以應對「三年經濟困難」<sup>⑦</sup>，既打亂了學校的教學安排，也讓勞動教育進一步服務於現實；非常規的教育方式改變了原來勞動觀念中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關係，後者的重要性被無限放大。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總方針<sup>⑧</sup>，各級學校教育學生「升學或參加勞動（特別是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同樣是光榮的」<sup>⑨</sup>，勞動教育的範圍進一步縮窄，農業勞動被標舉到特殊位置。

從1960年代起，勞動教育滲透到革命人生觀及革命傳統教育等階級教育中。在革命激情的烘托下，師大女附中學生從《人定勝天》（1959）、《江山多嬌》（1959）一類的革命電影中看到是「三面紅旗」的「無往而不勝」；學校由此鼓勵學生「在貧下中農的指引下『識別』地主富農」，「對『甚麼階級說甚麼話』有了較深體會」<sup>⑩</sup>，階級教育與勞動教育動員學生下鄉務農的目標結合。隨着階級鬥爭的弦愈繃愈緊，下鄉務農也成為出身不好的學生「淨化」、鍛煉自身的儀式。

## 七 餘論：勞動教育對一代學生的影響

勞動教育有兩個目的：改造「唯有讀書高」的「舊意識」；動員無法升學的畢業生務農以解決升學危機。兩者源自1949年前，且在1949年後仍一直困擾着中國近現代轉型，文革前的勞動教育也因此兼具危機應對和意識形態教育的雙重使命。以後者衡量，勞動教育的效果並不理想，起到的作用極為有限。在升學危機可控之時，勞動教育尚有轉圜的餘地，特別是在1957年前，來自蘇聯及延安經驗的雙重影響，使得勞動教育具有「腦體並用」、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理想主義色彩，國家意志也因此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內化為個體的驅動力。從前述吉敬容的日記可以看出，與那種認為意識形態教育呆板、單調、空洞的慣常經驗不同，1950年代中期的勞動教育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體驗，多少改變了學生的勞動觀念。但愈來愈嚴重的升學危機使得勞動教育的意識形態建構空間日益狹隘，僅透過循循善誘不足以讓學生接受放棄升學和回鄉務農，於是有了1957年漢陽一中事件中的強力彈壓，致使升學意識隱蔽化。

在決定開展勞動教育的時候，國家並沒有將其作為上山下鄉的預熱——比如開始時強調「腦體並用」，「教育大躍進」時還暢想全部學生得以升學<sup>②</sup>，但1958年後「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和大躍進的發展改變了勞動教育，勞動觀念中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由兩者並重變為偏重於後者，並將勞動教育逐漸限制在農業生產方面。因此，後來勞動教育慢慢成為上山下鄉的序幕。儘管勞動教育並非國家在主觀上預設成上山下鄉的準備工作，但它實際上卻有這方面的效果：1950到1960年代的勞動教育不可能不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裏留下痕迹，在客觀上讓學生對參與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做好了長期的心理準備。

較之城鎮裏的一般子弟，幹部子弟有更大的選擇餘地，但當時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家長的引導下選擇了最「革命」的方式，顯示了體力勞動至上觀念的盛行。1964年，已經考上本校高中的北京景山學校初三學生郭小林決定中斷學業，到北大荒八五二農場做一名農工。對於長子的選擇，郭小林的父母郭小川夫婦毫不猶豫地同意了（郭小川是毛澤東時代的著名詩人，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秘書長）。郭小林猜測，父親同意自己去北大荒的原因有三：他相信「大學裏培養不出作家」，「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郭小川本人中學畢業後即參加革命，沒上過大學，也成了作家；體力勞動能給人以鍛煉<sup>③</sup>。

郭小林回憶，與他同去北大荒的學生中，應屆生多是自願報名，多是良好出身，很多人立志做「革命接班人」——「過勞動關」在當時被認為是「革命接班人」必經的考驗；而往屆學生大多出於就業目的<sup>④</sup>。這種觀察與很多學生的經歷是吻合的。比如，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學學生曲折在上中學時聽說農村人才缺乏，與全黨大辦農業的任務脫節，遂在1960、1963、1964年三次萌生下鄉願望。高考前夕，有實力報考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曲折把教科書送人，每天在學校勞動，等待分配<sup>⑤</sup>。

上海的高中畢業生歐陽璉在1959年(重慶)、1961年至1963年初(重慶)、1964年中至1980年(新疆阿克蘇)三次下鄉，但他和幹部子弟精英意識的自主選擇相比，要無奈許多：高中畢業後因就業無門，加上繼母當家，關係難處，最終成為文革前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十萬上海知青中的其中一人<sup>⑤</sup>——這也是不少城鎮子弟畢業後放棄升學、參加下鄉的側寫。

與同齡人相比，農村學生對勞動教育的態度也許是最淡漠的。經歷了1953年後歷次升學危機和政策轉變，這些曾一心想升學脫貧的學生已接受了務農的命運。1956年大舉「擴招」之際，眾多農村子弟卻選擇了退學：山西全省在校學生較1955年減少三萬，較1953年減少了十萬。他們退學的原因要麼是「畢了業也是回鄉生產，遲不如早」，要麼是家庭無力供給子女學費或膳費<sup>⑥</sup>。河南及北京也有類似情況，「這些要求退學的學生，絕大部分是農民的子弟」<sup>⑦</sup>。即使是「教育大躍進」前後，招生政策仍一直向城鎮傾斜。從1961到1965年，吉林省城市、縣鎮初中招生343,325人，高中招生61,876人，而農村對應招生數字分別是156,723人和8,818人<sup>⑧</sup>。

城鎮子弟和農村子弟無疑是那一代學生中的大多數，勞動教育的實施既讓前者或主動或被迫放棄升學，最終捲入上山下鄉大潮，也阻礙了後者向上流動、向城鎮流動的渠道，改變了他們各自的命運。

### 註釋

- ①②③ 王鐵：《怎樣進行勞動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頁25；63-88；24-42。
- ④ 潘鳴嘯(Michel Bonnin)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70；〈大有作為〉，《人民日報》，1964年5月4日，第6版。
- ⑤ 山田敏一著，趙仰夫譯：《歐美的勞動教育》(上海：上海新學會社，1929)。此書介紹英、美、法、德、荷蘭、比利時等國勞動教育開展情況時，均分為學校文化教育及職業教育兩大部分。
- ⑥ 楊賢江：〈英國勞動教育之發達〉、〈美國工場教育之設施〉、〈德國之勞動教育〉，三文分見《教育雜誌》，第14卷第7期(1922年)，頁1-4、5、11-13。
- ⑦ 如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提出「人類均力說」，參見劉集林選編：《中國社會思想史資料選輯·晚清卷》(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381；李大釗譯：〈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1913年4月1日)，載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註：《李大釗全集》，第五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544。王光祈主張「勞力的工人都去念書……念書的人都去作勞力的工」，參見姜銳、魯法芹：《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文化的相遇》(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177。
- ⑧ 〈教育的警鐘——《人民教育》1957年5月號社論〉，載人民教育社輯：《中小學勞動教育和參加勞動生產問題》(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頁24。
- ⑨ 劉子久：〈勞動教育和勞動實踐〉，《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 ⑩ 山東省教育廳：〈山東省中學、師範進行勞動教育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載山東人民出版社編：《中學各科教學中貫徹勞動教育的經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5)，頁3；〈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山東省教育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錢昌照的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7月5日，第10版。
- ⑪ 任雲仙、張耀：〈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小學勞動教育探析〉，《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頁90-96；劉亞娟：〈建國初期勞動教育的興

- 起和上海的地方性實踐》，《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頁167-72。
- ⑩ 丁文杰：〈1949-1989年：勞動教育的演變歷程及特徵〉(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頁11。
- ⑪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5。
- ⑫ 斯密(Adam Smith)、洛克(John Locke)、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等都曾對勞動進行經濟學或哲學的界定；馬克思對「勞動」的界定集中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
- ⑬ 梁啟超：《新民說》(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110、122-23。
- ⑭ 漢俊：〈為甚麼要印這個報？〉，《勞動界》，1920年第1期，頁3。
- ⑮ 一些刊物直接以「勞動」命名，如《勞動音》、《勞動》、《勞動與婦女》；另一些以「勞動」為主要內容，如《新社會》、《上海夥友》、《工人周刊》(北京)、《嚮導》、《政治生活》、《中國工人》等。
- ⑯ 1920年春，北京大學長辛店演講組「扯着旗幟，開着留聲機，加勁的講演起來，也不過招到幾個小孩和幾個婦人罷了」，婦人「臉上堆着雪白的粉，兩腮和嘴唇卻又塗着鮮紅的胭脂，穿上紅綠的古式衣服……把鮮紅的嘴張開着，彷彿很驚訝似的，都不敢進前來。」參見鄧中夏：〈長辛店演講組的報告〉(1920年4月13日)，載人民出版社編：《鄧中夏全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72-73。
- ⑰ 斯諾(Edgar Snow)著，胡愈之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03。
- ⑱ 瞿秋白：《多餘的話》(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頁11。
- ⑲ 鄧中夏：〈與鄭鴻鈞信〉(1921年11月17日)，載《鄧中夏全集》，上冊，頁152。
- ⑳ 李景漢：〈京兆農村的狀況〉，《現代評論》，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頁7。
- ㉑ 黃道炫：《張力與界限：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130-31。
- ㉒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271-86；〈五四運動〉(1939年5月)、〈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45-47、549-57；〈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13-30、849-80、931-39、1101-1104等。
- ㉓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載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頁83。
- ㉔⑰ 孫景超：〈林縣一中是怎樣進行勞動教育的〉，載《中小學勞動教育和參加勞動生產問題》，頁27-28；29-32。
- ㉕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學校生產情況向華北局並中央的報告〉，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446。
- ㉖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關於北京市中小學健康教育工作近況報告〉，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卷，頁242、244。
- ㉗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市中小學生負擔及生活情況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卷，頁257。
- ㉘ 〈王文祉的教學計劃〉，轉引自劉進：〈女附中勞動教育一瞥〉，載王本中主編：《教育敘事》(北京：自印本，2017)，頁295-96。

- ⑩ 〈師大女附中各科教學目的草案〉，載《教育敘事》，頁297。
- ⑪ 楊孔熾等：《從古典到現代：外國普通中等教育改革歷程》（廈門：鷺江出版社，2001），頁285。
- ⑫ 〈編者的話〉，載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譯：《為加強勞動教育而鬥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頁1-2；包德列夫：〈培養學生對待勞動和公共財物的共產主義態度〉、斯圖德尼茲：〈勞動習慣的培養〉、〈教育學生愛好農業〉，載《為加強勞動教育而鬥爭》，頁1-6、19-27、66-71。
- ⑬ 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市的重點中學，吉敬容於1954到1960年在該校就讀。2017年，她從中學日記中摘取有關勞動教育的部分，編成〈女附中六年勞動日記（1954.9-1960.8）〉，此文收錄進王本中主編：《口述春秋》（北京：自印本，2017），頁369-96。下文所引吉敬容經歷，均出自此文，不再一一交代出處。
- ⑭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68-91。
- ⑮ 教育部部務會議文件〈關於1955-1956學年度中學實施基本生產技術教育的指示〉曾下發至全國各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檔案室存有這份檔案。參見劉進：〈女附中勞動教育一瞥〉，頁300。
- ⑯ 〈認真學習、大力貫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人民教育》，1957年第9期，轉引自《教育敘事》，頁301-302。
- ⑰ 1914年，京津某中學「升學者三之一，謀事不得者二之一」；1915年江蘇公私立各中學升學率為23%，1916年為39%，畢業生「大都無業，或雖有業而大都非正當者也」；1917年江蘇省高小畢業生能升入中學者「不及四之一」。參見黃炎培：〈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1917年），載郭麗、徐娜編：《鄉村建設派》（長春：長春出版社，2013），頁314。1920年代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中學畢業生的升學率是19至20%，參見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439-41。
- ⑱ 〈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人民日報》，1956年1月1日，第1版。
- ⑲ 〈陸定一同志在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1月1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165。
- ⑳ 〈中央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指示〉（1956年2月24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一冊，頁212。
- ㉑ 〈國務院發布關於保證完成今年高等學校招生計劃的指示〉，《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第2版。該報導使用的數據與表1略有不同。
- ㉒ 張奚若：〈目前國民教育方面的情況和問題〉，《人民日報》，1956年6月21日，第3版。
- ㉓ 〈努力完成今年高等學校招生計劃〉，《人民日報》，1956年3月17日，第1版；〈國務院發布關於保證完成今年高等學校招生計劃的指示〉，第2版。
- ㉔ 〈三十五萬青年報考高等學校〉，《人民日報》，1956年7月14日，第1版。
- ㉕ 1953年9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教育部門應首先集中力量發展高等教育。參見張軒：《中國高等教育制度變遷研究》（北京：現代出版社，2016），頁66。
- ㉖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五次講話〉，載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宣傳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10—1957.12）》（武漢：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出版時間不詳），頁153。
- ㉗ 〈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 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就業和學齡兒童入學問題 張奚若的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3月19日，第4版。
- ㉘ 〈少奇同志的報告記錄〉，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沙文漢工作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頁158-59。

- ⑤① 〈全國中學教育會議勝利閉幕 根據總路線確定中學教育方針任務〉，《人民日報》，1954年2月2日，第3版；董純才：〈為培養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成員而努力〉，《人民日報》，1954年8月8日，第3版。
- ⑤② 〈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吳玉章 在「五一」節給全國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人民日報》，1954年5月3日，第3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 關於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人民日報》，1954年6月12日，第1版。
- ⑤③ 〈勞動教育必須經常化〉，《人民日報》，1957年3月16日，第1版；〈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民日報》，1957年3月29日，第1版；〈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人民日報》，1957年4月8日，第1-2版；〈要在農村中安家立業〉，《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1日，第1版；〈教育部調整中學教學計劃 特別重視加強勞動教育 開設生產勞動科，以生產知識和技能武裝學生〉，《人民日報》，1958年3月17日，第7版。
- ⑤④ 〈共產主義教育和階級教育——朝鮮勞動黨中央機關刊物《勞動者》第二十期發表的編輯部文章〉，《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5日，第3版。
- ⑤⑤ 如介紹朝鮮經驗時指出：「加強勞動教育是加強階級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朝鮮勞動黨的教導下，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已經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風。……青年知識份子到農村安家落戶，加強農業戰線，已經習以為常，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情。」（參見葉劍英：〈訪問千里馬的國家〉，《人民日報》，1963年12月2日，第3版。）又如分析晚明詩人錢澄之的詩：「黃犢初教成，我鋤子則犁；犁鋤豈不苦，衣食道在茲」，說明古代知識份子也有對子弟進行勞動教育的觀點（參見黃籽耘：〈讀錢澄之的《田園雜詩》〉，《人民日報》，1962年8月28日，第6版）。
- ⑤⑥ 〈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人民日報》，1953年12月3日，第1版。
- ⑤⑦ 〈教育部黨組關於初中和高小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宣傳教育工作報告〉（1955年4月12日），載王衛國主編：《建國以來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法規文獻彙編》（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5），頁273-74。
- ⑤⑧ 山東省教育廳：〈山東省中學、師範進行勞動教育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頁9-10。
- ⑤⑨ 王鐵：《怎樣進行勞動教育》，頁108、116；山東省教育廳：〈山東省中學、師範進行勞動教育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頁10。
- ⑥① 雪華堂：〈分片召開應屆畢業生家長會，講清升學與就業的道理〉，《河南通訊》，1957年第6期，頁1-2。
- ⑥② 〈長春中學應屆畢業生中有90%-95%打算繼續升學〉，《內部參考》，1957年4月10日，頁10。
- ⑥③ 李恭宇：〈甚麼是學校內部的主要矛盾〉，《學習通訊》（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學習室），第92期（1957年6月8日），頁16-17。
- ⑥④ 在河北的座談會中，劉少奇對中學生說：「祖國不需要你們升學」，城市中手工業、工業、機關、學校和商業的吸納能力有限，絕大多數人只能從事農業。在河南的講話中，他說：學生和農民互相學習，學生學好技術，就會被農民選為代表，到縣裏、省裏、中央，因此「前途是前明的」；又說：「我們一百多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大學畢業的很少。」「我們死了……誰來幹呢？就是年輕的人，就是現在的小孩子來代替麼。」參見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頁80-89；〈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第1-2版。
- ⑥⑤ 〈武漢市今年約有二萬三千多名初中、高小應屆畢業生不能升學〉，《內部參考》，1957年4月10日，頁8-9。
- ⑥⑥ 文革結束後，在漢陽一中事件中被判刑十年的女教師胡斌先後給有關部門寫了八十九封信申冤。198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發文，請中共湖北省委複查此案。2000年前後，武漢市蔡甸區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走訪複查團的參與者、事件的親歷者、受害人，將他們的口述回憶收入武漢市蔡甸區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蔡甸區文史資料》，第八輯（武漢：蔡甸區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2000）。這是目前對漢陽一中事件最翔實的記錄。以下對漢陽一中事件的記述皆出自此書，不再一一標明出處。

- ⑥⑥ 〈天津市中等學校反右鬥爭中獲重大勝利〉，《天津日報》，1957年9月29日，第2版。
- ⑥⑦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頁92-94、102-104；朱岩：〈1956年的漢陽一中事件〉，《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頁38-39。
- ⑥⑧⑨ 羅致：〈淺談師大女附中（1949-1966）的思想政治教育〉，載《教育敘事》，頁147、155、175；145。
- ⑥⑩⑪ 李若建：《折射：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頁151；147-48。
- ⑥⑫ 據王奇生與筆者所通郵件，2018年8月19日。
- ⑥⑬ 據筆者對王書香的採訪，2018年8月22日。
- ⑥⑭ 孫成民：《四川知青史》，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頁105。
- ⑥⑮ 張家騏、夏寶棠：〈武漢市是怎麼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載《中小學勞動教育和參加勞動生產問題》，頁95、97。
- ⑥⑯ 中國人民大學下放幹部隊編：《知識份子怎樣通過勞動鍛煉改造思想》（北京：北京市豐台區中捷友好社，1958），頁1。
- ⑥⑰ 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1958年8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07。
- ⑥⑱ 相關觀點被整理成〈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餘勞動〉，發表於1957年5月5日的《中國青年報》社論欄，第1版。
- ⑥⑲ 劉少奇：〈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1958年5月30日），載《建國以來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法規文獻彙編》，頁28。
- ⑥⑳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490、492。
- ㉑⑳ 吉林省教育廳編：《吉林省三十四年教育統計資料》（長春：吉林省教育廳，1983），頁88、99；138。
- ㉒⑳ 〈通縣文教局關於試辦農業中學的初步意見〉，北京市通州區檔案館，教委檔，056-002-00009-3，頁16。
- ㉓⑳ 〈關於我縣試改農業中學的計劃（草案）〉，北京市通州區檔案館，教委檔，056-002-00009-4，頁32。
- ㉔⑳ 〈教育部調整中學教學計劃 特別重視加強勞動教育 開設生產勞動科，以生產知識和技能武裝學生〉，《人民日報》，1958年3月17日，第7版。
- ㉕⑳ 熊賢君：《深圳教育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280；281-82。
- ㉖⑳ 〈北京市教育局黨組關於妥善安排中、小學學習和勞動問題的報告〉，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卷，頁921。
- ㉗⑳ 〈阿克蘇事件始末——歐陽璉口述〉，載劉小萌編：《中國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450；450-51。
- ㉘⑳ 王進等主編：《毛澤東大辭典》（桂林：灕江出版社，1992），頁716。
- ㉙⑳ 〈北京師範大學對附屬中學1963-1964學年度教學工作的幾點意見（草案）〉，載《教育敘事》，頁293。
- ㉚⑳ 柳維光：〈談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就業問題〉，《人民日報》，1957年4月5日，第7版。
- ㉛⑳ 據筆者對郭小林的多次訪談和往來郵件，2018年8月7日至13日。
- ㉜⑳ 〈「奮鬥、求索，始終是這代人的主題曲」——曲折口述〉，載《中國知青口述史》，頁62-63。
- ㉝⑳ 〈山西省農業合作化以後的新情況〉，《內部參考》，1956年4月10日，頁224。
- ㉞⑳ 〈教育農民不要讓子弟中途退學〉，《人民日報》，1956年3月18日，第6版。